

詩聖杜甫與中國詩道

p. 121-150

嚴 壽 澂

【本文提要】

吾國詩學傳統之所重，在仁心之感發。詩固言志，然志當發於真情。而情必根於至性，方可謂之真。則知言志與抒情，本非二致。詩固宜溫柔敦厚，然詩亦可以怨。若遇所親者之大過，仍不哀憤痛切，豈可謂之溫柔敦厚乎？保此仁心，培養擴充，則天地萬物，皆可入於性量之中，乃能有擔當，有襟抱，民胞物與，念念關心。以此性量，發而為詩，又有筆力以達出之，則固詩之聖也。其杜少陵之謂乎。

杜甫之所以為詩聖，治中國文學史者殆無異議。然而推崇老杜的理由，新舊傳統實有不同。現今通行於中國大陸的各種文學史著作，大多以「現實主義」為評判的標準：杜詩之所以偉大，在於達到了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的頂峰。而所謂現實主義，主要在於反映社會現實。此乃數十年來新傳統的說法。中國詩歌源遠流長，自有其一貫的詩道。根據這一舊傳統，老杜之所以為詩聖，不在其「反映」什麼（不論是「現實」還是「時代」），而在其言志以情性為本，自胸襟自然流出。若無真性情，而只是「反映」社會現實，不論其反映如何深刻，算不得第一流的詩。新舊傳統的根本差異在此。二者的是非優劣，姑置不論。然而若對這一舊傳統了解不夠，僅以新傳統的說法（不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時下流行的各式西方理論）套用於中國文學，難免削足適履之譏。

本文試以中國傳統詩道為準則，說明杜少陵何以為詩之聖。中國詩教精神，濫觴於《尚書》〈虞夏書〉「詩言志」一節，申論於《詩大序》。這一精神的理論基礎，在仁心的感通。本文首二章，即是對此的闡述。與老杜並世的二大詩人李白、王維，一有仙氣，一精禪理；其飛揚之想、幽邃之思，或為少陵所不及。然而涕淚中無非天地民物，黎庶饑溺之念、家國憂患之情，觸物而興，隨感而發，則太白、摩詰較之少陵，遜乎後矣。至文生於至情，至情本於仁心。詩聖之本，正是這一至誠惻怛的仁心。有此仁心，乃能與萬物為一體，乃能有擔當；發而為

詩，必有襟抱，必有魄力，必有當於時世。杜詩之大，正在於此。至誠惻怛，即是孟子所謂不忍人之心。此心不昧者，必有民胞物與之念，於人間世的疾苦，乃至草木蟲魚的摧殘，絕不會漠然無動於中；目睹擾擾紅塵之內，禍亂相尋，醉夢相續，後人知哀前人而不暇自哀，則不免悲往事，思來者，冥心玄覽，睹物興懷。杜詩之所以能深能細者，當於此求之。本文第三、四、五章，對此試作解析。儒家詩教，固主溫柔敦厚，然而仁者必有勇，能好人，亦能惡人；故詩可以怨，亦可以哀而憤。於杜詩可證。此乃本文第六章所欲申述者。

一、中國詩道之源：〈虞夏書〉與〈詩大序〉

鄭玄〈詩譜序〉云：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①

孔穎達《毛詩正義》引鄭君註《尚書》「詩言志」節曰：

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②

康成此註，要點有二：(一)所謂詩，乃是個人志意的發抒，(二)發抒以詠嘆（「長言」）出之，其聲中於律呂。這可說是古人言詩的通義。

《毛詩》〈大序〉對此更作申論：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中略）至於王道衰，禮樂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① 今傳《古文尚書》列此節於〈舜典〉，《今文尚書》則列於〈堯典〉。

② 見孔氏所疏鄭君〈詩譜序〉。

孔穎達釋「詩者，志之所之」三句云：

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於心，謂之爲志。發見於言，乃名爲詩。言作詩者所以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感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爲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

又，釋「發乎情，民之性也」二句云：

「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③

以上所釋，乃是詩的本體（用孔氏的話來說，乃「作詩之意」）。可概括爲四點：（一）人之所以能感能慮，在於有心。心爲外物所感，便有了定向的活動；此即所謂志。此蘊藏於內的「志」，發而爲言，便成了詩。其中關鍵，在感於哀樂，「心志憤懣」，不得不以嗟歎歌詠發之。凡此都是出於自然之不容已，非造作的產物。由此可以引申：若是中無所感而強爲發抒，則是無病呻吟，不足當詩之目。若是有意「反映」現實而作詩（亦即非出於自然之不容已），亦算不得上乘。（二）感乃是雙向的：心感物而動，形成了「志」；志發而爲詩，亦能感動外物。亦即詩由時世風俗而成，亦能移風易俗；二者處於感通不息的過程之中。（三）民性不同（按：此所謂性，乃「生之謂性」之性，非孟子「性善」之性），所欲言的「志」也各別，自然不能強求一律。（由此可以推論：以「文藝政策」「指導」創作之類，自不爲中國傳統詩道所許。）（四）雖人各有志，不同如面，然而悅豫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則「哀傷起而怨刺生」，則是人人所同。作詩者之所以能「發乎情，止乎禮義」，在於先王遺澤尙存，社會還不至於漆黑一團，作詩者雖有憂愁之志，尙能自持。若在滄海橫流、哀鴻遍野之世，怨刺之聲大作，乃理勢之固然，不能責怪作詩者背於禮義，只能責怪在上者「澤」竭，無以沾溉下民。因此，變風變雅自有其價值。

綜上所述，可知中國詩道的重心，在一「感」字。《文心雕龍》〈明詩〉篇所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正是對此的總結。近人強分「言志」與「抒情」爲二（如朱自清〈詩言志辨〉即說：「自從陸機提出了『詩緣情而綺靡』之說，『情』和『志』才有分別」），顯爲未究本末之論。中國詩學傳統所欲辨明者，只是情之邪正與志之大小；至於情與志本身，原是心物相感過程中的不同階段，又豈能判爲胡越？

③ 《毛詩注疏》（《四部備要》本），卷一之一，頁三上～下、八下。

二、詩教精神：仁心感通

近世理學通儒馬一浮（湛翁），闡發詩教之義極精。其論詩「以感爲體」云：或問王輔嗣：「《易》以何爲體？」答曰：「以感爲體。」^④余謂輔嗣此言，未盡其蘊。感者，《易》之用耳。以感爲體者，其惟詩乎？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志即感也。感之淺者，其言粗近；感之深者，其言精至。情感所發爲好惡；好惡得其正，即禮義也。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孔子說《詩》之言也。詩教本仁，故主於溫柔敦厚。仁，人心也。仁爲心之全德，禮樂爲心之合德。禮樂由人心生，是以《詩》之義通於禮樂。程子曰：「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故《易》爲禮樂之源，而《詩》則禮樂之流，是以《詩》之義通於《易》。政事之得失寓焉，是以通於《書》。民志之向背見焉，是以通於《春秋》。六藝之旨，《詩》實賅之。詩教之義大矣哉！^⑤

湛翁以六藝統一切學問，而《詩》可賅六藝，可見其對詩教的重視。詩之體則是感。感有深淺的不同，故詩之言有精粗遠近之別。詩之能精至者，因好惡之情得其正。好惡何以能得其正？在止乎禮義。禮義生於人心，人心之本則是仁。因此，詩的第一義諦，便是仁心的感通。

儒家道德觀基於仁。鄭康成以「相人偶」釋仁。清儒臧琳（玉林）《經義雜記》「人偶」條釋曰：

鄭康成注經，每有「人偶」之語。（中略）《禮記》〈中庸〉「仁者，人也」，注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疏人，先親己親。《表記》「仁者，人也」，注謂「施以仁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言『舍之』何？人也。」《正義》曰：「『仁者，人也』，言仁恩

④ 按：湛翁此處記憶有誤。被問者乃是慧遠，非王弼。《世說新語》〈文學〉曰：「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答。」

⑤ 見王培德、劉錫嘏記錄，烏以風、丁敬涵編次《馬一浮先生語錄類編·詩學篇》，載《馬一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三冊，頁1007～1008。又見丁敬涵編注《馬一浮詩話》（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頁7～8。

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⑥

所謂「人」或「人偶」，指的是「行仁之法」，亦即「以人情相愛偶」。人之所以能如此，在於人心之能感通。

程明道曰：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⑦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人我，家國天下之事，事事關心。〈詩大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穎達《正義》釋此節云：

「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者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中略）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爲。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⑧

風、雅的區別，是否如孔氏所言，姑置不論。而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何以一國之事，乃至天下之事，能「繫此一人使言之」？原因正在家國天下之事，痛癢關心，如程明道所謂「認得爲己」，故能攬一國，乃至天下之意以爲己意，以爲己心。仁心愈大者，所「攬」亦愈大；然而詩人所道者，終究只是「一人之心」而已。

由此可見，中國詩道所主張的，是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結合。^⑨詩人不管如何心繫家國天下，所道的卻只是一人的感受；若非如此，便不能說是有性情。近世桐城古文家姚永樸（仲實）著《文學研究法》，其〈性情〉一章，對此闡述

⑥ 《皇清經解》卷二零三，頁七下～八上。

⑦ 《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5。

⑧ 《毛詩注疏》，卷一之一，頁六上。

⑨ 徐復觀先生論此甚精，可參看其〈傳統文學思想中詩的個性與社會性問題〉，載所著《中國文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5年），頁84～90。

頗明，以爲「剛柔緩急，胥於文章見之。苟不能見其性情，雖有文章，僞焉而已」。又說：「蓋既爲文學家，必獨有資稟，獨有遭際，獨有時世，著之於辭，彼此必不能相似。」^⑩易言之，文辭若無獨有的性情，即無個性可言；若無個性，即非真文學。文章尙且如此，詩當然更是如此。然而這一人，決非自了一己之事，而是與天地萬物相感通，「莫非己也」。否則只是客氣浮感，不能說是有真性情。明人王嗣爽論杜詩曰：「一言以蔽之曰：以我爲詩，得性情之真而已。」^⑪正是指此而言。所謂「性情之真」，即是孟子所說的「不忍人」的仁心。對此仁心的最好形容，便是「忠厚惻怛」。馬湛翁曰：「老杜所以爲詩聖，正在其忠厚惻怛，故論詩必歸於溫柔敦厚。」^⑫明乎此，方可論杜詩。

三、詩聖之本

清儒李光地《榕村語錄》論選詩曰：

古來芳藻名篇，豈必篇篇入選？去取之間，要當有一點意思在。若必全說道理，亦不是。有經史在，何取有韻之文？「性情」二字差近之。觸物感事，卻關到性情上。^⑬

這段話總結了中國舊傳統評詩的標準：詩以感爲體；觸物感事，情動於中，發而爲詠嘆之言，此即是詩。若是全說道理，則經史優爲之，何必取於詩？就說道理而言，詩受到格律與形式的束縛，豈能勝於文？（同理，若就反映現實而言，有散文、戲劇等在，亦何取於詩？詩反映現實的功能，又豈能勝於敘事文或小說？）詩的價值，在於感發興起；然而感發興起若不與性情相關（即無「道理」，無「一點意思在」。由此可見，「言志」與「載道」並非矛盾；強爲分判，乃現代學者的誤解），終非真詩。榕村所謂性情，亦即王嗣爽所說的「性情之真」。宋明儒所樂道的「至性」、「真情」、「真性情」、「性其情」等等，都是指此而言。此真情非他，正是忠厚惻怛的仁心。

⑩ 《文學研究法》（合肥：黃山書社，1989年），頁95～96。

⑪ 《杜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影印上海中華書局本，1986年），卷首〈杜詩箋選序〉，頁2。

⑫ 《馬一浮詩話》，頁23。

⑬ 《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31。

七十年前，繆彥威（鉞）先生撰〈詮詩〉一篇，刊載於《學衡》雜誌。其言曰：

詩之質有三：一曰深遠之思，一曰溫厚之情，一曰靈銳之感。夫詩者，言之精也，情之華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隱顯同符，表裏合契。故詩中之思，即詩人之思也；詩中之情，即詩人之情也。然凡鄙淺近之思不足貴，必期乎深遠焉；虛矯偏激之情不足尚，必期乎溫厚焉。又，西人論文學重想像，騁玄思於無極，挫萬物於筆端，飾色增奇，文章司命。而欲想像豐融，要必慧心善感，故以靈銳之感殿焉。^⑭

這一段話，賅本括末，簡要清通，確是名論。三者之中，當以溫厚之情爲本。所謂溫厚之情，即是忠厚惻怛的仁心。少陵具此仁心，不忍見生靈之塗炭，不忍見家居之撞壞，加之學識足以濟其深思，稟賦足以資其銳感，三美兼備，所以爲詩聖。

清人梁運昌（江田）著有《杜園說杜》，其附錄〈杜譚百一〉曰：

「每飯不忘君國」一語，是全部杜詩大綱領。余更有一語曰：一生憂在黎元。恰好作一對。其所流露處，皆本於性真，不是空張門面語。故自許稷契，而人皆信之。^⑮

人與人之間，以聲氣相感通；其情真者，感人必深。詩中之情之思，即是詩人之情之思；詩人不真不誠，強作門面語，不論如何矯飾，感人必不能如真誠者之深。阮大鉞詩即爲一例。錢默存先生指出，阮詩貌似恬澹，然而「其詩格衿澀纖仄，望可知爲深心密慮，非真閒適人」。^⑯老杜之所以「自許稷契，而人皆信之」者，在其詩之詞氣格調，溫厚惻怛，一如其人。此即是真誠。

方東樹曰：

詩以言志，如無志可言，強學他人言語，開口即脫節。此謂言之無物，不立誠。若又不解文法變化、精神措注之妙，非不達意，即成語錄腐談。是

⑭ 轉引自劉咸炘（鑑泉）《風骨集》附錄，載其《推十書》（成都：成都古籍書店影印本，1996年），第三冊，頁2036。鑑泉讀此文後，即附印於所編《風骨集》卷末，評曰：「究本括末，簡要超常，不獨非時流鈔勦蕪冗者比，即先士名論，亦未有是。」推許可謂至矣。

⑮ 見《杜園說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稿本，1995年），頁1097。

⑯ 見其《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63。

謂言之無文無序。若夫有物有序矣，而德非其人，又不免鸚鵡、猩猩之誚。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嘗讀相如、蔡邕文，了無所動於心。屈子則淵淵理窟，與《風》、《雅》同其精蘊。陶公、杜公、韓公亦然。可見最要是一誠，不誠無物。試觀杜公，凡贈答之作，無不情真意摯，至今讀之，猶自感動。無他，誠焉耳。^{①⑦}

植之此論，可說是直探詩道本原之言。依中國傳統詩道，詩可分四等：若「無志可言，強學他人言語」，亦即全無自己的性情，乃是「言之無物」（可見此所謂「物」，不僅是「社會現實」而已，尚包括一己的性情）。是謂詩之最下者。言之既有其物，修辭亦有其誠，然而於詩的字法、句法、章法等，懵然不解（亦即不講究今人所謂「形式」），則是「言之無序」。是謂次下。言之有其物，亦有其序，然而不精不誠，依然不能動人，亦非詩的上乘。惟其言有物，亦有序，且情真意摯，方謂之最上乘。而所謂現實主義，其最高標準是反映社會現實，至於此一「反映」是否關涉一己的性情，則並非其題中應有之義。在中國舊傳統中，如此的詩作，其品位只是在三、四等之間而已。杜少陵若僅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實不足為中國的詩聖。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結尾云：

白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

杜園評曰：「自己沾溼，乃思大庇天下之人。此老胸襟闊大，妙在自然流露。若香山之『千里裘』，未免有意模倣矣。」^{①⑧}按：白香山〈新製布裘〉云：

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
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又，其〈新製綾襖成〉云：

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
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饑凍聲。
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

以此二詩與上述杜詩相較，有意模倣之跡顯然。

①⑦ 《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2～3（卷一）。

①⑧ 《杜園說杜》，頁450（卷八）。

清末詩家郭曾炘（匏廬）對此更有申述：

余謂杜公於流離困頓中忽然發此異想，乃〈北征〉詩「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之反面觀，乃真閱歷語、真沈痛語，非身歷世難者不能道其隻字，不僅仁心以爲質也。白詩亦脫胎於杜意，然此長篇，韋蘇州已有「邑有流亡愧俸錢」一語，足以賅括之。稍具良心者能言之，與杜不可同日論也。^{①⑨}

杜、白二公之詩，俱是仁心的表現，但一爲自然流露，一則稍有做作。不僅如此，少陵此作，是經過一番閱歷後的沈痛語，乃親證者的現量；而香山二詩，則是出自擬議的比量。就情真意摯而言，白白遠不如杜。王嗣爽評「二吏」、「三別」曰：「此五首非親見者不能作，他人雖親見亦不能作。」^{②⑩}惻怛的仁心，加之以親證，即是「誠」。此詩之所以動人者，無他，誠也。

老杜有〈夢李白〉二首，其二云：

浮雲終日行，游子久不至。
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
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
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三夜頻夢故人，不說己思故人心切，偏說故人於我情親。忠厚之情，即此可見。更謂故人之魂，亦已非自由之身，來此既已不易，且不可久留；江湖風波險惡，萬望路途珍重。夢醒之後，悵然若失：如太白之才而不容於斯世，夫復何言！不禁感慨而至於憤激矣。可謂交情、詩情俱至，確是「真者，精誠之至也」。

老杜不僅對故人情真意摯，即使是對舊時所謂「下人」的童僕，亦是頗有情意。〈信行遠修水筒〉即爲一例。其詩曰：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
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
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

^{①⑨} 《讀杜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184。

^{②⑩} 《杜臆》，頁83（卷三）。按：「二吏」指〈新安吏〉、〈石壕吏〉。

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
 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
 日曛驚未發，貌赤愧相對。
 浮瓜供多病，裂餅嘗所愛。
 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
 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②①}
 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詩人對信行的秉心清淨、執事勤快，稱許甚至，可謂語摯情深。「往來四十里」二句，設身處地，為信行著想，更是難能可貴。「日曛」二句，寫信行薄暮歸來，竟尚未用餐，不覺既驚且愧，裂己尋常所愛食之餅以食之。惻隱之心、忠厚之態，於此畢現。最後四句，更謂信行直道而行，不存機心；稱頌之中，亦流露了感謝之情。

〈負薪行〉一首，則流露了對蠻荒婦女的深摯同情，尤為不易。其詩曰：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
 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
 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
 十猶八九負薪婦，賣薪得錢應供給。
 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
 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
 面粧首飾雜啼痕，地偏衣寒困石根。
 若道巫山女羆醜，何得此有昭君村？

此詩所詠，乃夔州土風。夔州地處僻遠，風俗薄惡，對待婦女尤為不公。際此戰亂頻仍之世，男子多陣亡，婦女只能負薪奔走，支撐門戶，為處女以沒世，其苦更甚於平昔。詩人對此充滿了同情之感。全詩基調，大不同於後世的竹枝詞之類。「更遭喪亂」、「一生抱恨」、「至老雙鬢」、「筋力登危」、「死生射利」、「地偏衣寒」諸句，正如王嗣爽所謂，「形容婦女之苦極矣」，^{②②}非當日養尊處優的中朝士大夫

②① 上句錢謙益箋，乃用《神仙傳》所載葛玄事：玄取三符投水中，一順流而下，一逆流而上，一停立不動，須臾三符合於一處。見《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189（卷六）。下句據黃生注，乃用後漢耿恭居圍城中，穿井不得水，乃整衣而拜，井泉奔出事。「蓋」，當作「拜」，為後人妄改。見其《杜詩說》（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頁65（卷二）。

②② 《杜臆》，頁244（卷七）。

所能道。夔州女如此勞作，其面貌之爲羸醜，自不待言。然而老杜強調，此乃生活煎迫而成，非水土使然，否則昭君何以亦生於此地？全詩經此一結，更益沈痛。

少陵至誠惻怛的不忍人之心，隨處觸發，如〈又呈吳郎〉云：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沾巾。

吳郎西鄰有一婦人，無食無兒，常至吳宅堂前撲棗，以爲果腹之資。吳郎欲插籬以防其來。老杜因寫此詩以開示之：此婦人若非困窮無助，寧能有此？我輩非但不可插籬以阻其來，轉須與之親近，消其疑慮，使其不致因恐懼而不來。爲此婦人著想，可云至矣。老杜對吳郎的勸告，亦甚婉轉：我知吳郎欲插籬，非爲鄰婦，乃防遠客；此已屬多事，本大可不必。而鄰婦必誤以爲乃是對付自己，因生恐懼。此五、六二句既回護吳郎，又關到前聯之意。最後又借鄰婦平日自訴之言，發爲感慨，歸結到戰亂與徵求。明人盧世漣（德水）評曰：「八句中，百種千層，莫非仁音，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②確是的論。

少陵的藹然仁者之心，亦及於物類，〈觀打魚歌〉即爲一例。此詩於捕魚、烹魚之狀，極盡形容。結尾筆鋒一轉，云：「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鬣，咫尺波濤永相失。」於飽餐之餘，思及咫尺波濤之間，此盤中之魚已與其同伴永相失散，能不慘然於懷？此詩後，有〈又觀打魚〉一首，結尾云：「干戈兵革鬥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我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哀矜黎元之念、愛惜物類之情，觀打魚之際，不由觸發，仁厚之意盎然。

五律〈孤雁〉與〈猿〉，亦爲仁及物類之例。〈孤雁〉中四句云：「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孤雁之哀鳴與詩人之情，兩相感應；聲氣相感之際，詩人以己心體會孤雁之心，物我融而爲一。此即程明道所謂「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的仁者境界。〈猿〉詩云：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

艱難人不見，隱見爾如知。

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

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詩人最爲關切的，是猿之如何能全生，如何能父子相保。先見猿之跳跟於山間樹

② 轉引自郭曾忻《讀杜笥記》，頁397。

上，料想應有其知能；忽而又思及，猿騰躍之性，只是「慣習」、「從衆」而已，而欲全生，此尚不夠，或須「用奇」。最後更苦心告誡：爾等騰越之間，務須相互顧及，莫使父子相離。拳拳懇切之情，自一「莫」字可見。

〈過津口〉詩有句云：「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實是見道之言。人與物之別，仁與不仁之分，由心的通塞而定。上引諸詩，都是與萬物相感相通的例證。感通之資，則是內心一點忠厚惻怛的仁心。是謂詩聖之本。

四、杜詩之大

方東樹極言杜詩之大曰：「杜公包括宇宙，含茹古今，全是元氣。」又曰：「杜、韓之真氣脈作用，在讀聖賢古人書，義理志氣胸襟源頭本領上。」^{②④}此所謂源頭本領，正是陸象山所說的「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②⑤}〈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及〈北征〉二首，體現了杜公的志氣胸襟，可說是詩中絕大著作，為前此所未有。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起首云：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
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

杜詩何以能大、從這幾句可見。其中最須注意的，是「憂」、「拙」、「愚」三字。仁者絕非白了漢，家國天下，常繫己懷，一物不得其所，即為己憂。生命有盡，憂則無盡。際此喪亂之世，念及蒼生，焉能不五內如焚？然而己無寸柄在手，雖志在稷契，又何能一展抱負？明知不可為，卻仍冀其有為，一息尚存，此志不渝。而且決不枉尺直尋，以求倖獲。居此濁世而「許身」如此，豈非「愚」且「拙」乎？

此詩隨後又說：

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②④ 《昭昧詹言》，頁 210～211（卷八）。

②⑤ 見《宋元學案》（上海：世界書局，民國二十五年），頁 1066（卷五八〈象山學案〉）。

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
 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
 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
 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
 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
 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
 終愧巢與由，未能改其節。
 沉飲聊自適，放歌破愁絕。

少陵雖知道自己不是廊廟之材，但是繫心家國，如葵藿之向陽，情不能已。厥因爲何？此心「不忍」故也。際此國家多事、民生多艱之時，如何能忍心袖手旁觀而不思補救。此即是仁；有此仁心，便能有胸襟，有擔當，便能著眼於天下之安危、黎民之休戚，不囿於一己的榮辱得失。杜詩之所以爲大者，志尙大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載安溪李光地解此詩曰：

自首句至「愁絕」句，皆自敘其志尙也。竊比稷、契而不遇，而猶覲此志之伸，至於取笑而不顧者，蓋雖有江海之志而不忍忘君，雖非廊廟之材而不可奪志故也。仕路之徒如螻蟻之求穴，鑽營趨附，我則所慕者大，恥事干謁，所以至於老而不遇，猶不能變其夙志，以徇巢、由之節，可謂窮矣。故向之浩歌激烈者，今又放歌愁絕也。^{②6}

所論甚精，於少陵心事，可謂抉隱發微。少陵「恥事干謁」，乃出於性真；雖有江海之志而仍不能忘懷於斯世，亦是由於情之不容已。如此立身行己，「居然成濩落」，實是勢所必至。歷來純正儒家的悲劇性格，癥結正在於此；杜少陵潦倒一生的悲劇命運，癥結亦在於此。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最後說：

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
 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
 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
 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②6 轉引自《讀杜笥記》，頁47～48。

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

歷經險阻，終於返抵家門，而幼子已不幸餓死。因思自己既免租稅，亦無須從軍出征，苦已至於此極，則天下失業之徒、遠戍之卒，其苦況為如何？於是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可見杜詩之大，不僅在於天下之事繫於己懷，更在於能推己及人，因己饑己溺而哀憐天下人的饑溺，所抒寫者或是一己的瑣事，而其性量則包括宇宙。此乃儒術的真血脈，亦是一部杜詩的真血脈。

浦起龍云：老杜「天寶間詩，大抵喜功名，憤遇蹇，憂亂萌三項居多。」^{②7}「喜功名」乃唐人常態；盛唐時邊塞詩，多表現此種心態。清人沈垚〈史論立命篇〉謂：「唐世士大夫以功業濟世為名」，「隨時隆污，恩澤必及於下，故其功豐」。

^{②8}此乃這一心態的正面結果。王船山則挾出了「喜功名」心態的負面效應：

苟其以立功為心，而不知德在己而不在事與，則功者，有盡之規也。內賊未除，除之而內見清矣；外寇未戢，戢之而外見寧矣；百姓未富，富之而人有其生矣；法制未修，修之而國有其典矣。夫既內無肘腋之姦，外無跳梁之敵，野鮮流亡，而朝有綱紀，則過此以往，復奚事哉？志大而求盈，則貪荒遠之功；心滿而自得，則偷晏安之樂。所願者在是，所行者及是，所成者止是，復奚事哉？邪佞進，女寵興；酣歌恆舞，而曰與民同樂；深居晏起，而曰無為自正。進厝火積薪之說者，無可見之徵；抱蟻穴金隄之慮者，被苛求之責。智淺者不可使深，志小者不可使大，度量有涯，淫濫必汎，蓋必然之勢矣。^{②9}

唐世士大夫功名心過重，往而不反。唐之由盛而衰，與此風俗之弊有莫大的關係。老杜之有別於當時一般士大夫者，正在所見者大，不以立功為心，不以封侯為念，深見「貪荒遠之功」、「偷晏安之樂」的危害。^{③0}前後〈出塞〉十首，即為其例。

^{②7} 《讀杜心解》（臺北：臺灣中華書局，影印雍正間原刻本，1970年），卷首下〈讀杜提綱〉，頁四上（頁64上）。

^{②8} 《落帆樓文集》（《吳興叢書》本），卷四（《後集》一），頁一上～下。

^{②9} 《讀通鑑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778～779（卷二二）。

^{③0} 有關唐世士風之弊，可參看劉咸忻〈唐士風論〉，載《推十書》第一冊，頁327～346（《右書》卷六）。

〈後出塞〉之三云：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功勳。
豈知英雄主，出師互長雲。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
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
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起首四句，點出當世受病之原：今日士大夫以勳業爲重，與古時以守邊爲重者不同；偏又遇英雄之主，好大喜功。「憂亂萌」之情，溢於字裏行間。「六合」二句，用「已」字、「且」字斡旋，更見此舉出征之爲多事。「遂使」以下六句，由朝廷又說到士大夫，極寫「貔虎士」的豪情，正以見有識者之憂慮。確如浦起龍所說，全章「斷續吞吐」，「純用虛機，而含諷之旨，即從此露出。」下一章則「說到冒功濫恩，隨手逗出驕凌之勢，殷憂已見於此」。^{③①}從朝廷到士子，皆以立功爲心而不知修德，於是因喜功而開邊，因開邊而濫恩，更因濫恩而驕侈，因驕侈而民困；晏安酖毒，無所底止。此即前後〈出塞〉所透露的殷憂之念，與哲人船山的剖析，若合符節。詩聖所見者大，即此可見。

清季況周頤論詞，有「重拙大」之說，其《蕙風詞話》卷一第六十則曰：

《玉梅後詞》〈玲瓏四犯〉云：「衰桃不是相思血，斷紅泣，垂楊金縷。」

自注：「桃花泣柳，柳固漠然，而桃花不悔也。」斯旨可以語大，所謂盡其在我而已。千古忠臣孝子，何嘗求諒於君父哉？^{③②}

亦即大小之分，在詞心而不在詞境。詞如此，詩亦然。以天下爲己任，固是大；寫薄物細事，亦非不可以語大。忠誠惻怛，盡其在我，此即是大。少陵有五律〈擣衣〉一首，正是薄物細事中見大之例：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
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
寧辭擣熨倦？一寄塞垣深。
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此詩前三聯，託戍婦思良人以見意。思婦明知夫婿征戍不返，而秋至之日，依然

③① 《讀杜心解》，卷一之一，頁十二上～下（頁12～13）。

③② 《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21。按：《玉梅後詞》爲蕙風自作（「玉梅詞人」爲其別號）。

拭清砧而擣衣，欲遠寄塞垣；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用情之深可見。雖是代言體，卻非天性涼薄之輩所能道。末聯則以詩人自己口吻出之：請聽空外擣衣之聲，可知已用盡閨中之力；「盡其在我」之情，從「用盡」二字可見。清人黃生論此詩極精，茲摘錄於下：

望婦而寄衣者，常情也；知不返而必寄衣者，至情也，亦苦情也。安此一字於首，便覺通篇字字是至情，字字是苦情。人臣具此至情，必不敢敵屈其君；人君悉此苦情，必不忍草菅其百姓。此一詩也，而興觀群怨具矣。^{③③}這段話可以補充上述蕙風論「大」之旨。凡是至情之人，必有擔當，必求其在己者，不責於在人者；對方或漠然不省，或冥頑不靈，我則仍盡其在我，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子之澤畔哀吟、杜老之行在喜達，同此至情，同此苦情，亦同其爲大。

即使在顛沛流離之際，仍能超出一己的窮通，思及萬民之憂樂。這是杜詩之大的又一面。〈遣遇〉詩即是一例證：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
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
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
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
石間采蕨女，鬻市輸官曹。
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
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
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
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
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
白喜遂生理，花時甘緼袍。

舟行途中，遇風濤之險，目睹窮民困苦之狀，覺自己雖非利涉，相較之下，還算生理得遂，豈可不安於自己的境遇？故題曰「遣遇」。「聞見事略同」二句，意謂他人聞見，亦與此略同，可以想見普天下窮民的遭遇，而困窮的原因，正是在上者的盤剝。此二句確如浦起龍所謂，「推廣暢論，極淋漓愷惻之致」。^{③④}

「貴人豈不仁」二句，則道出了「刻剝及錐刀」的原由：貴人如此誅求，並非內心與民爲敵，而是不以汝等小民爲重，視汝等與草芥無異，若須去除，便當

^{③③} 《杜詩說》，頁210（卷六）。

^{③④} 《讀杜心解》，卷一之六，頁十三下（頁155上）。

去除，一無足惜，與孔子所謂「使民如承大祭」（《論語》〈顏淵〉）恰相反。王嗣奭評此二句曰：

「貴人豈不仁」一轉，洞悉民隱。蓋貴人亦知愛民，不過欲生財以濟國之急，而不知索錢多門，不堪黠吏之漁奪，歸過於上，而自逃法網，然貴人不知也。^{③⑤}

除此之外，「貴人」二句尚牽涉到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老子則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這兩句話，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國態度。一方以為，民具有首位的價值，無任何一物可以加於其上；社稷與君，都是為民而設。理想主義的儒家持此看法。充量至極，便是孟子所謂「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另一方則以為，民只是萬物中的一物，其本身並無特殊的價值。老子所謂「不仁」，並非指肆虐於萬物，殘民以逞，而是指萬物代謝，功成者去，無所足惜。柄國者持此看法，當國家有急需之時，自然以為，刻剝及於錐刀以濟國用，有其必要。因此，貴人之「不仁」，不在「不知」需索多門，只便黠吏之漁奪，而在視民如「莠草」，如「芻狗」（不是《孟子》〈離婁下〉所謂「文王視民如傷」），絕非貴於君，貴於社稷。杜詩中種種有關軍國大事的議論，出發點正在孟子之教，視民為最重。所以馬湛翁說：「杜詩最深厚，是儒家氣象。」^{③⑥}杜詩之大，固不僅在「詩史」也。

五、杜詩之深與細

陳寅恪先生〈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後〉曰：

少陵為中國第一詩人，其被困長安所作之詩，如哀江頭哀王孫諸篇，古今稱其文詞之美，忠義之忱，或取與王右丞「凝碧池頭」之句連類為說。殊不知摩詰藝術禪學，固有過於少陵之處，然少陵推理之明，料事之確，則遠非右丞所能幾及。^{③⑦}

^{③⑤} 《杜臆》，頁 367（卷下）。

^{③⑥} 《馬一浮詩話》，頁 22。

^{③⑦} 載所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57～58。

寅恪先生此文，貫穿史料，剖析精詳，證明少陵對當日時勢知之深，故能推理明而料事確。〈洗兵馬〉即爲一例。此詩乃收京後作，如王嗣奭所謂，「喜躍之象，浮動筆墨間」。^{③⑧}起首云：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
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
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

中云：

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
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

王氏復評曰：

云「獨任朔方無限功」，又云「郭相謀深古來少」，當時收山東者諸將也，而公獨注意於郭，見公識高慮遠。使肅宗果能「獨任朔方」而不間於闡豎，則太宗之業可復完矣。即此一語，繫唐室安危，可以詩人目之哉？^{③⑨}少陵之所以「識高慮遠」，乃至「一語繫唐室之安危」，亦在其對當時情勢了然胸中，故能判斷準確。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盡心上〉）（按：趙岐《孟子章指》釋「達」爲「顯達」；朱子《集註》則釋爲「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安、史亂後，少陵間關跋涉，顛沛流離，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④⑩}雖不得於君，而情繫朝廷，心存黎庶，孤臣孽子之志，不稍衰歇。「操心危而慮患深」，故能明於形勢，達於事理，遠勝並世大詩人太白與摩詰。

安、史亂前所作〈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曰：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
請公問主將，安用窮荒爲？
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

③⑧ 《杜臆》，頁 78（卷三）。

③⑨ 同註③⑧，頁 79。

④⑩ 朱子註《孟子》此章「疢疾」句曰：「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脫身簿尉中，始與筆楚辭。
 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
 答云一書記，所愧國士知。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
 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
 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
 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
 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此詩乃送友人高適入哥舒翰幕府所作。臨歧贈別，善禱善頌，本是送別詩常規。此詩則在頌禱之餘，寓規勸之意，流露了對國事的深憂。郭曾忻《讀杜笥記》引查初白（慎行）評此詩云：

此蓋深不滿於哥舒之窮兵，而惜高之側翅相隨也。起四句衝口而出，下乃婉曲致意。高白云受國士知，乃告之曰：人實不易知，未必哥舒果知子，子亦未必盡知哥舒也。一「慎」字深情畢露。

復引杜園（梁運昌）評云：

哥舒立功，公獨以爲生事，達夫受辟，公亦不以爲喜，看後日授河西尉不拜，則公意可知矣。^{④①}

此詩所表露的，不僅是深厚的友情而已。高適入哥舒幕，爲的是「脫身簿尉中」，現在既蒙主將特達之知，將來容有封侯之望。顯然此君亦是「重功勳」風氣中人物。少陵則頗不以爲然。起首四句是一篇總綱：方今臨洮（按：崆峒山在臨洮）秋熟之時，但願王師罷征，俾農民得遂生計。請君告知主將：疲我內地之民以得此窮荒之地，究竟有何益處？如此見解，以民生爲重，功勳爲輕，乃出於孤臣孽子的深心遠慮，與功名之士截然異趣。此意蘊藏胸中已久，與友人臨歧道別，不覺衝口而出，更見仁者不容已之情。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云：^{④②}

④① 《讀杜笥記》，頁29～30。

④② 浦起龍註曰：「韋諷，成都人。『上』，恐當作『赴』。公寶應初，先有送韋攝閬詩，茲豈重歸後即真，公復送歟？」見《讀杜心解》，卷一之四，頁五上（頁90上）。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
 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
 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
 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爲德。
 韋生富春秋，洞微有清識。
 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
 當令豪奪吏，白此無顏色。
 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
 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淒惻。
 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浦起龍評曰：

起四句，述時艱；中段，扶積弊而正告之；後四句，丁寧以送之。不獨爲當時藥石，直說破千古病痛。^{④③}

黃生評曰：

錄事參軍，職司糾彈，故以擊貪吏告之。軍國事繁，徵求固所不免，尤苦貪墨之吏，從中更朘削耳。有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必若」二語，亦無奈何中作此痛哭流涕之論耳。^{④④}

秦漢以後，封建既廢，統治階級厥惟官僚。官吏與民的利益，本不一致，若糾察機制不完善，必至蝥賊遍於域中，虐民病國。軍國事簡，官吏虐民機會較少；軍國事繁，便大有利於官吏的割剝。若在多事之秋，費用不得不多，百姓受官吏的朘削自然亦愈烈。真欲民生安樂，根本之計在鏟除官僚特殊階級。但在事實上無此可能，故浦氏謂之「千古病原」。老杜對此，知之甚明。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希望戰爭止息，軍國事簡，故〈晝夢〉詩云「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同元使君春陵行〉云「獄訟永衰息，豈惟偃甲兵。淒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然而身處安、史之亂，戰事未見止息，只得退而更求其次，即黃生所謂「有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於是一則期望在上者能節用，如〈有感五首〉之三云「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一則期望司糾彈之吏能去除殘民太甚之「蝥賊」。黃生所謂「無奈何中作此痛哭流涕之論」，確是的評。

④③ 同註④②。

④④ 《杜詩說》，頁 59（卷二）。

老杜之有此深識，根本原因在於以仁恕之心體察人情物理，如〈秋野五首〉之一云：「棗熟從人打，葵荒欲白鋤。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其二云：「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題桃樹〉云：「高秋總饒貧人食，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凡此都是後世理學家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的仁之境界。此一境界，常可見於其詠物詩。清人吳農祥（星叟）論老杜詠物詩云：「公詠物不沾沾於一物，常用廣大心、悲憫心、利益心、贊歎心觀之。」^{④⑤}「廣大心」云云，都是天地生物之心的註腳。以此心觀物，便能體察入微，物我一體。

鍾惺（伯敬）曰：

少陵如〈苦竹〉、〈蒹葭〉、〈胡馬〉（中略）諸詩，於諸物有讚美者，有悲憫者，有痛惜者，有懷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勸戒者，有計議者，有用我語詰問者，有代彼語對答者，蠢者靈，細者巨，恆者奇，默者辯。詠物至此，神佛聖賢帝王豪傑具此，難著手矣。^{④⑥}

少陵詠物詩之所以能臻此境界，關鍵在一「情」字。如〈病橘〉云：

群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爲？
惜哉結實小，酸澀如棠梨。
剖之盡蠹蟲，采掇爽其宜。
紛然不適口，豈只存其皮？
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
玄冬霜雪積，況乃迴風吹。
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
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
寇盜尙憑陵，當君減膳時。
汝病是天意，吾諗罪有司。
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
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因病橘而思及入貢，思及寇盜縱橫，君王減膳，乃至天寶時獻荔枝。「汝病是天意」一句，透露了全詩主意，即黃生所說：「公意謂欲弭盜賊當恤民，欲恤民當白人君躬行節儉始，此實當時根本之計，此詩蓋觸事發之。」^{④⑦}此一議論因

^{④⑤} 轉引自《讀杜笥記》，頁122～123。

^{④⑥} 轉引自上書，頁122。

^{④⑦} 《杜詩說》，頁54（卷二）。

見病橘而發，故前半狀寫病橘頗細。其中最足以見老杜性情的，是「蕭蕭」二句：葉雖半死，卻仍在枝上，似不忍別故枝而去。「不忍」一句，真是藹然忠厚之言，無意流露，豈寡情者所能道？

五律〈螢火〉云：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
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
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
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對於螢火之類微細生物，亦是未能忘情。前半是代螢火爲言，敘寫細膩。「幸因」、「敢近」二語，予微物以情性。末句更是充滿了愛憐之情。又，〈促織〉云：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
草根吟不穩，床下夜相親。
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
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寫促織，自以哀音爲主。三、四摹寫哀音，五、六自哀音生發。結句以「天真」收合，黃生以爲，此乃老杜「詠物家數」；又評曰：「絲竹雖悲，人也；促織雖細，天也。天則真，人則不真。此語詩流不能道，學究亦不能道。」^{④⑧}所言甚諦。詩流不能道者，因其無此仁心；學究不能道者，因其以理抑情；老杜能道者，以其真情發於至性也。

繆彥威先生〈詮詩〉曰：

詩人敦厚之情，不但能藏諸己感乎人而已，兼能推其情以化萬物，蠢然冥然之物，自詩人視之，皆有溫柔敦厚之情焉。讀杜甫〈除架〉、〈廢畦〉二作，可以見矣。^{④⑨}

二詩中所見的溫柔敦厚之情，即是張橫渠〈西銘〉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情。〈除架〉詩曰：

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疏。
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
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
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④⑧ 同註④⑦，頁212～213（卷六）。

④⑨ 見《推十書》第三冊，頁2037。

白花已結，青蔓功成，寧辭被除？盡我所能為，不望果報，是為儒家道德的基石，在此詩中自然流露。《荀子》〈禮論〉曰：「今夫大鳥獸則失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按：即「沿」〕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儒家制三年之喪，即是基於這一報本反始的敦厚之情。老杜此詩中，秋蟲暮雀，徘徊鳴號，留連於牢落的廢架而不忍去，所體現的正是此一敦厚之情。

又，〈廢畦〉云：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
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
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
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此詩因廢畦而抒慨。首聯寫榮落之感，次聯表現了纏綿的憐惜之情。尾聯則如浦起龍所說，「回思玉盤春薦，曾幾何時，而今零落如許，是可悲也。」^{⑤①}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梁惠王上〉）此一君子之仁，詩中且推及於秋蔬。

這一至性真情，本為人人所固有，而人往往陷於物欲而喪失，以致相互劫奪，相互殘殺，變怪百出，不知底極。老杜〈可嘆〉詩云：「天上浮雲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真是慨乎其言之矣。秉此悲天憫人之情，對古往今來的人生萬態，不免時生感慨，觸物而發。〈縛雞行〉一首，正是這類觸物興懷之作。詩曰：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
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
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
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雞蟲得失，交戰於胸中，必如《莊子》〈人間世〉所謂「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內熱不息，則猶如「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殢」（《莊子》〈達生〉），決不可能見理明而料事確。惟有以廣大仁心，物各付物，臻於朱子所謂「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的境界，^{⑤②}方能超越一己的利害得失，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詩末句，確乎見道之言。浦起龍對此詩結語的評說，頗見理趣，茲抄錄於下：

^{⑤①} 《讀杜心解》，卷三之二，頁十二上（頁302上）。

^{⑤②} 《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一冊，頁5（卷一）。

蓋物不自齊，功無兼濟，但所存無間，便大造同流。其得其失，本來無了，注江倚閣，海闊天空。惟公天機高妙，領會及此。^{⑤②}

所謂「所存無間，大造同流」，正是仁心廣大；具此仁心，便能見道深而察物細，與萬物感通而不隔。其杜少陵之謂乎！

六、仁者必有勇

一部杜詩，大多是藹然仁者之言。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仁者必有勇」（《憲問》）。何以「仁者必有勇」？朱子註曰：「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皇侃疏引殷仲堪曰：「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受命，若身手之相救焉。存道忘身，斯爲仁矣。」^{⑤③}少陵處濁亂之世，具民胞物與之懷，抱身手相救之忱，見黎庶百姓展轉於水火之中，又豈能隱忍而不發？「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新婚別》）「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無家別》）。這一類悲憤激烈語，杜詩中時時可遇。而此悲憤激烈，正是出於溫柔敦厚。

溫柔敦厚並不等於蘊藉和平。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溫柔」爲文，「敦厚」爲質。君子薰陶於禮樂之中，故能「溫柔」。君子之質則是「敦厚」，亦即忠恕。忠以立己，恕以待人，禮樂以文之，發而爲詩，自能蘊藉和平。然而若處於非常之際，又當別論。孟子對此有極好的說明。孟子曰：「有人於此，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中略）〈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告子下》）安、史之亂，朝廷播遷，生靈塗炭，就老杜而言，乃家國之至痛、君父之大過，若仍是發爲和平中正之音，則是風痺不知痛癢人之所爲，如何談得上溫柔敦厚？

明末清初儒者錢澄之（字飲光，號田間）對此深有解會，其言曰：

近之說詩者，謂詩以溫厚和平爲教，激烈者非也。本諸太史公所云：「《小雅》怨誹而不亂。」吾嘗取《小雅》誦之，亦何嘗不激乎？譏尹氏者旁連

⑤② 《讀杜心解》，卷二之三，頁五上（頁235上）。

⑤③ 《論語集解義疏》（《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90（卷七）。

姻婭，刺皇甫者上及艷妻，暴公直方之鬼蜮，巷伯欲畀諸豺虎，「正月繁霜」之篇，「辛卯日食」之行；可謂極意詢厲，而猶曰其旨「和平」，其詞「怨而不怒」，吾不信也。且夫無病而呻，不哀而悼，謂之不情。有如病而不呻，哀而不悼，至痛迫於中，而猶緣飾以爲文，舒徐以爲度，曰：「毋激，恐傷吾和平也。」有是情乎？情之發也無端，其曰止諸禮義者，懼其蕩而入於邪也。若夫本諸忠愛孝友以爲情，此禮義之情也，性情也；性情惟恐其不至，可謂宜得半而止乎？^{⑤4}

若身處暴戾乖張的板蕩之世，仍以「怨誹而不亂」爲藉口，「緣飾以爲文，舒徐以爲度」，以悲慨激烈爲禁忌，則不是怯懦，即是麻木。豈有藹然仁者而能如此？

仁者的怨恨與悲憤，乃出於至性至情之不容已，不得不以嗟歎歌詠發之。〈前出塞〉之一云：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
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唐朝疆土已甚廣大，尙是開邊不已，限期徵發，並以嚴刑峻法對付亡命者。少陵不能已於言，直斥當道，爲民請命。「君已」二句，口氣憤激。「棄絕」二句，悲憤中更帶淒楚。

〈後出塞〉之四云：

獻凱日繼踵，兩藩靜無虞。
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
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
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極寫主將凱旋，滿載而歸，不可一世之狀。末二句突作轉折，點出主將擁兵自重，殘民以逞。

錢謙益論前後〈出塞〉曰：

〈前出塞〉爲徵秦隴之兵赴交河而作，〈後出塞〉爲徵東都之兵赴薊門而作也。前則主上好武，窮兵開邊，故以從軍苦樂之辭言之。後則祿山逆節

^{⑤4} 〈葉井叔詩序〉，載《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頁259～260（卷十四）。

既萌，幽燕騷動，而人主不悟，卒有陷沒之禍，假征戍者之辭以譏切之也。^{⑤⑤}安、史亂前，開邊與立功是朝野上下一致的風氣。少陵則本於仁心，對此痛心疾首，在詩中直言斥責，不稍顧忌。安祿山在當時，更是一個炙手可熱的顯赫人物，邊人若敢議論，甚或性命不保。少陵詩則秉承儒家身國天下通一之教，直言無隱，在詩中借征戍者之口以譏切之。足見仁者之勇。

〈遣興〉三首之一云：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
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
朽骨穴螻蟻，又爲蔓草纏。
故老行歎息，今人尙開邊。
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
安得廉恥將，三軍同晏眠。

此詩一斥開邊，二斥邊將的貪瀆與邀功生事。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君王沈溺於開邊，將帥勢必邀功生事。將帥愈生事，愈能得主上的歡心，而邊疆則愈不安寧，邊民死者亦愈衆。前車已覆，後車復蹈之而不悔。這黃葉蔓草的古戰場即爲明證。老杜對此，悲從中來，不能不大聲疾呼了。

〈三絕句〉之三云：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
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此處的「官軍」，乃是宦官首領魚朝恩統帥下氣焰熏天的禁兵，本望其殺賊衛民，而竟暴虐如此。^{⑤⑥}王嗣奭評曰：「『殿前兵馬』縱暴同於羌渾，今以爲恆事，且不必殿前兵馬也，望其殺賊得乎！」^{⑤⑦}甚能得詩人之意。義憤填膺，不得不發，字字鐵鑄，如董狐之直筆，此即仁者之勇。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有句云：

^{⑤⑤} 《錢注杜詩》，頁 92～93（卷三）。

^{⑤⑥} 浦起龍注曰：「注意尤在此章，刺中人與禁軍也。禁軍之害，等於山賊羌渾，可以鑑矣。」見《讀杜心解》，卷六之下，頁十三下（頁 639 下）。按：「渾」指吐谷渾。

^{⑤⑦} 《杜臆》，頁 354（卷九）。

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
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
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
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
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
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
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今人常艷稱唐朝疆域廣闊，國勢強盛，但有唐一代，禍亂之日實多於太平之時，而禍亂與唐代的社會風氣大有關係。唐代風氣有二大特點，一為功利主義，一為胡化。⁵⁹唐人立身行事以功利主義為準則，權力慾極為旺盛。開邊、重功勳、事奔競，乃至任用酷吏、大肆屠戮等，都是這一風氣下的產物。至於胡化的結果，則是淫奢驕縱、尚武好殺。統治階級的驕縱淫奢，必至橫徵暴斂，加上尚武開邊，人民的負擔更為沉重。以上二詩，即是對這一風氣的嚴厲批判。哀憤痛切的言辭背後，是敦厚的仁心。

儒家固以溫柔敦厚為詩教，溫柔敦厚本於仁，仁者必有勇。由仁心而生的哀憤痛切之情，亦是詩教題中應有之義。六十年前，龍榆生（沐勳）撰有〈如何建立中國詩歌之新體系〉一文，對吾國詩學精神頗有闡發。其言曰：

予少時誦歐陽永叔之文云：「自古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未嘗不驚怪其言，以為詩必窮而後工，則吾人何必學詩，以自取窮途，迷不知返耶？既而稍讀孔孟之書，歷覽屈子以來，下逮陶淵明、杜少陵諸家之篇什，又飽更憂患，乃幡然有省，惘然若有所失，確信非詩能窮人，必其人志潔行廉，而有「由仁心而生之勇氣」，不恤一時之毀譽，不顧一身之利害者，始可與言詩也。詩以道情性，而情性之真，恆易為流俗所染污，物慾所汨沒。如是而發為歌詠，要不出乎諛辭、淫辭、邪辭、

⁵⁹ 史家傅樂成著有〈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一文，對此敘述頗詳，可參看。載所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頁339～382。

遁辭。四者「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如是，則詩教幾於絕矣。惟詩人爲能不失赤子之心，而有大無畏之精神。以是恆與世相鑿柄，往往發大獅子勇猛，以與濁穢社會相搏鬥，或竟坐是橫遭挫折，冥心一往而無悔者。此悲壯之詩，所以能廉頑立懦。而「由仁心而生之勇氣」，實爲建立中國詩歌新體系之最大柱石也。^{⑤9}

所謂「不恤一時之毀譽，不顧一身之利害」、「冥心一往而無悔」、「不失赤子之心，而有大無畏之精神」諸語，正是仁者之勇的註腳。

〈寫懷二首〉之一有句云：

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
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
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鉤曲。
曲直我不知，負暄候樵牧。

「用心」二句最能道出老杜的仁者之心。所謂「但問耕耘，不問收穫」，所謂「功成不必在我」，正是此意。而此仁厚惻怛之意，乃是從胸中自然流出，不假安排，不可控遏，不以利害縈心，不以毀譽爲意。故仁者必有大無畏精神，大勇必在仁者。

^{⑤9} 載《同聲月刊》，第七號（一九四二年七月），頁1~2。按：該刊抗戰時出版於日寇佔領的南京。榆生時爲衣食計，任教於偽中央大學。然此文哀痛憤切，有感而發，出於真情，於中國詩學精神深有體會。結語云：「今者慘殺相尋，河山破碎，人類浩劫，靡有窮期。吾輩生而爲人，宜如何竭其所知所能，消此大戾。不特嘲花草、弄風雪，已非其時，即隱居求志，既非心之所忍，亦無山之可入。所望今之作者，秉其『由仁心而生之勇氣』，製爲歌詩，以導洩人類之煩冤苦毒，而激發其惻隱慘怛之天性。（中略）使韻協言順，聲入感交，庶幾民族精神、人類道德，咸得維持於不墜。」所言極沈痛，固不得以作於其時其地而少之也。

七、餘 論

少陵暮年，作〈詠懷〉詩二首，茲錄第一首於下：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
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爲。
嗟余竟轆軻，將老逢艱危。
胡雛逼神京，逆節同所歸。
河雒化爲血，公侯草間啼。
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
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
倏忽向二紀，奸雄多是非。
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
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
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
疲茶苟懷策，棲屑無所施。
先王實罪己，愁痛正爲茲。
歲月不我與，蹉跎病于斯。
夜看鄴城氣，回首蛟龍池。
齒髮已白料，意深陳苦詞。

浦起龍評曰：

公蓋有志用世者。起四句泛以人生立志言，重「得志行所爲」一句，爲全篇之主。「嗟余」一段，歷述禍亂始末，此不得志之由也。「本朝」一段，極言時弊難挽，此「不能行所爲」之歎也。末四句見志雖在而身已矣，反結「得志行所爲」意。^⑥

分析章法，條理井然，頗有助於對此詩的理解。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乃是儒家立身的準則。老杜一生轆軻，有志未伸，垂暮之年，回顧平生，其悽愴感喟之情，可以想見。然而家國天下，終不能捨棄，於是陳此危苦之詞，以詒後世之相知者。桐城方植之正是這樣一位後世相知者。其言曰：

⑥ 《讀杜心解》，卷一之六，頁十七下（頁158下）。

世人徒慕公詩，無一求通公意，故不但不能及之，並求真知而解之亦罕見。如公在潭州入湖南時〈詠懷〉二首，此公將沒時，迫以衰病，心志沈惋，語言陷滯，誠若不可人意。然苟求其志，則風調清深，豪氣自在。雖次第無端由，要見一種感慨歎惜之情，終非他人所及。蓋公一生懷忠國濟時之志，至是老而將死，決知不能行所為矣，故作此二詩。所謂「噉噉幽曠心，拳拳異平素」，又曰「意深陳苦詞」，不啻明訴之矣。是時遭臧玠之亂，軍儲困急，目擊悲憫，與〈送韋諷上閬州〉詩同意。而又方將遠適炎瘴，其意甚慘，鳴甚哀。乃自公歿，至今千餘年，無一人尋及。然則作詩以詒後人，孰克知之？可為拊心！^{⑥①}

人之相知，貴在知心。杜少陵暮年危苦之情，千年後得一方植之相知，亦可以說是「旦暮遇之」的了。

馬湛翁論詩曰：

詩不可勉強，要須出以自然。如阮大鍼集中亦作閒適沖淡之語，而其偽不可掩。老杜雖有時亦樸拙，然語語皆真，真便好。

作詩須是所感者深，胸襟廣大，則出語不落凡近。^{⑥②}

老杜〈詠懷〉詩之能感人，不在風調，亦不在字句與章法，而在情真。而所以能語語皆真者，則在感觸深、胸襟大，亦即陸放翁〈示子遹〉詩所謂「工夫在詩外」。故湛翁又曰：「學詩須知詩之外別有事在，學琴亦然。總須先有胸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先有詩意，乃能為詩；先解樂意，乃能為樂。」^{⑥③}所謂詩意，即是仁心感通，情動於中而發於外。老杜先有詩意，加之以詩功與筆力，所以為詩中之聖。

(本文作者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亞洲語言與文化學系)

⑥① 《昭昧詹言》，215～216（卷八）。

⑥② 《馬一浮詩話》，頁52、53。

⑥③ 同註⑥②，頁52。